

# 流放車臣人：原因、事實與後果

• 侯艾君

當代車臣危機的爆發根植於過去，而1944年的流放事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沙皇時代，流放政治犯到西伯利亞極其常見，斯大林則將強制遷徙這一手段運用到了極致。據統計，蘇聯在30到50年代將十五個民族和六百多個分屬不同民族的居民群體流放，總計約322萬人。北高加索是所有被流放民族中規模最大的地區。

2004年5月以來短短數月之內，俄羅斯遭受了一系列浪潮式的、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車臣總統卡德羅夫(Ахмед Кадыров)被炸身亡、兩架民航飛機同時失事、北奧塞梯上千名兒童及家長被劫持為人質的事件等等，這些恐怖襲擊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已經判明，這些事件背後都有車臣非法武裝的影子)，令俄羅斯和國際社會震驚。車臣問題仍然是俄羅斯的難解之結。我們認為，當代車臣危機的爆發根植於過去，而1944年的流放事件尤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在蘇聯時期，有關1944年流放車臣人的問題照例屬於學術禁區，沒有得到足夠研究；直到戈爾巴喬夫(С. М. Горбачев)執政後期才最終解禁。近年來，隨着車臣危機的爆發與持續，俄羅斯國內對該問題的研究也日漸深入，並且陸續公布了大量以前難以見到的檔案資料。我國學者則基本上少有專門研究，只在論述蘇聯或俄羅斯民族問題或宗教問題時提及，且語焉不詳。今年距離流放車臣人事件已經

整整六十周年，對該事件的討論再次受到特別關注。本文擬就1944年流放車臣民族的原因、歷史事實及其後果進行考察分析，與同行切磋。

## 一 為何流放車臣人？

蘇聯政府流放車臣民族，有其特定的歷史傳統和時代背景。

在沙皇時代，將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亞極其常見，而將整個民族集體加以流放，在各國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斯大林時期將強制遷徙這一手段運用到了極致。據統計，蘇聯政府在30到50年代總共將十五個民族和六百多個分屬不同民族的居民群體流放，總計3,226,340人(另一種說法是流放3,441,582人)<sup>①</sup>。整個北高加索地區是所有被流放民族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地區，幾乎涉及該地區的每一個民族。

在1944年流放車臣人和印古什人之前，斯大林政府已經採用過類似的

懲罰手段。在30年代初期的農業集體化運動中，有1,412,380人被流放到新建地，從那時起就有了「特種移民」(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的稱謂，而在北高加索地區甚至發生了暴動<sup>②</sup>。1939年到1940年之間，蘇聯進行了建立所謂「東方戰線」的軍事行動，先與德國劃分了波蘭，隨後又合併了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為防止這些民族反抗，蘇聯政府將這些國家中非共產黨的政治派別的領導人和活動家，以及宗教界人士、企業家、知識份子等加以流放。

1941年，蘇德戰爭迫在眉睫，蘇聯政府將近百萬波蘭人強制遷徙，而在戰爭爆發後，伏爾加河地區的日耳曼人首先遭到流放。隨後在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期間，以「與佔領者合作」為由又將克里木韃靼人、格魯吉亞梅斯赫廷人、卡爾梅克人，以及車臣人、印古什人、巴爾卡爾人、卡拉恰依人實施了流放<sup>③</sup>。

應該說明的是：被遷徙民族有一些共同特點，但是也有差別(既有質的差別，也有量的差別)。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兩類：警察鎮壓性的(懲罰性的)和行政強制性的。總體上來說，他們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較低，受到各種限制。對於車臣人、克里木韃靼人的流放，可以視為警察鎮壓性的，而對於朝鮮人、中國人的遷徙，則屬於行政強制性質(1937年，蘇聯政府為了清理與日本相鄰地區，曾從遠東地區將朝鮮人、中國人等強遷到中亞<sup>④</sup>)，兩者受到的待遇略有不同。車臣人、印古什人實際上是被剝奪了公民待遇，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在警察機關的監督和監視下進行勞動改造；無權選擇居住

地、參軍等，且持續時間長。朝鮮人則無須在警察局登記，而且在中亞流放地都得到妥善安置。

對於流放車臣人的原因，學術界的觀點極為紛紜。

一種說法認為，由於經濟形勢惡化、各民族爭奪包括土地在內的生存資源，北高加索地區一直存在着嚴重的民族、宗教衝突，是蘇聯國內一個最不安定的地區。將一些在衝突和爭端中較為活躍的民族流放，是一個可以選擇的解決辦法。此外，北高加索地區匪幫橫行，也加劇了蘇聯政府的擔憂<sup>⑤</sup>。

也有人認為：在外來危險面前，制度表現出了對潛在的內部敵人的不信任<sup>⑥</sup>。還有人認為：流放車臣人是為了防範因戰爭而高漲的車臣民族主義<sup>⑦</sup>。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於這些民族在30年代的集體化過程中，對蘇聯政府進行了激烈的抗拒，因而使斯大林極為惱怒<sup>⑧</sup>。

應該如何看待車臣人投敵附逆的情況？由近年來披露的檔案材料可知，確實有為數眾多的車臣人與德軍合作，甚至參加了德國軍隊。車臣—印古什共和國境內叛亂不斷，一些恐怖主義集團從事破壞活動，許多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遭到殺害；而且當地政府中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也與反蘇組織勾結在一起，為德國服務<sup>⑨</sup>。

但是，投降德國，與德國佔領當局合作的蘇聯公民中，並非只有車臣人，還有俄羅斯人等其他民族。據統計，與德國人合作的蘇聯公民或僑民有幾百萬<sup>⑩</sup>。30年代蘇聯政府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激起了強烈反抗，許多人遭到鎮壓。當外敵入侵的時候，

近年披露的檔案材料顯示，蘇德戰爭期間，許多車臣人與德軍合作，甚至參加了德國軍隊。車臣—印古什共和國政府人員也勾結反蘇組織，為德國服務。車臣人附逆的原因之一，是德國戰略家處心積慮地策反蘇聯的穆斯林。但是，投降德國，與德國佔領當局合作的蘇聯公民中，並非只有車臣人，還有俄羅斯人等其他民族。

所謂因車臣人叛變才將之流放，乃是一個方便的理由。事實上蘇聯政府對於車臣民族抱有很深的成見。1948年蘇共中央決議中曾寫道：「還在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歲月裏，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就是北高加索各民族之間建立友誼的障礙。」<sup>⑩</sup>在衛國戰爭後期流放車臣等民族顯然具有某種懲罰性質，是企圖用「斯大林方式」徹底解決「車臣問題」。

對蘇聯政府不滿的人就將德國人視為自己的解放者。

導致車臣人附逆的原因，還在於德國人處心積慮的策動，意味着德國在另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上取得了成功。德國戰略家高度重視策反蘇聯的穆斯林。衛國戰爭爆發前後，德國當局培訓了許多蘇聯僑民和蘇軍戰俘，讓其回到蘇聯境內與蘇聯政府為敵（當然，他們都只是被第三帝國利用的工具，因而客觀上成為德國的「第五縱隊」）<sup>⑪</sup>。

德國陰謀策動的切入點在於：車臣民族的歷史經驗、民族意識，以及蘇聯政府在不同時期犯下的嚴重錯誤，其意識形態是反布爾什維克主義。許多蘇聯人真誠地認為：希特勒會將自己從斯大林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於是，一方面，大量高加索人參加了德國軍隊，獲得第三帝國的勳章；另一方面，也有許多高加索人獲得了蘇聯的獎章（獎章名為「保衛高加索」）。戰爭期間，車臣族勇士努拉迪羅夫（Ханпаша Нурадилов）一人就消滅了950名德國人<sup>⑫</sup>。

蘇聯政府對於車臣民族也抱有很深的成見。1948年蘇共中央決議中曾寫道：「還在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歲月裏，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就是北高加索各民族之間建立友誼的障礙。」<sup>⑬</sup>在衛國戰爭後期、蘇聯已經勝利在望的時候，將車臣等民族流放，除了形勢的必需，還具有某種顯然的懲罰性質，同時也表明蘇聯領導人較為長遠的考慮。流放車臣人，乃是一個深謀遠慮的計劃，是用「斯大林方式」徹底解決「車臣問題」、穩定地區形勢的最後一次嘗試。所謂因車臣人叛變，乃是一個方便的理由而已。

## 二 流放車臣人的步驟

正如一位作者所寫的那樣，大規模的叛變，就應該報之以大規模的流放。1943年1、2月間，車臣—印古什共和國境內的德國入侵者被蘇聯紅軍徹底肅清，已經計劃恢復國民經濟，而就在這個時候，蘇聯政府開始擬訂流放共和國各民族的計劃。1943年底，強制移民計劃最終確定，蘇聯政府開始部署協調運輸事宜，許多地方領導人都已得知此事。該決定當時並沒有在報紙上公布。索爾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認為：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損害蘇聯國家的聲譽、和讓西方敵人沒有可乘之機<sup>⑭</sup>。直到1946年6月26日，《消息報》（Известие）才公布命令，稱由於車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韃靼人與德軍合作，而將其流放。

流放車臣等民族，是貫徹了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的意志，而具體負責人則是貝利亞（Л. П. Берия），貝利亞親自坐鎮北高加索，並定期向斯大林彙報流放行動的進展。蘇聯政府對流放行動做了具體周詳的安排，調集了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的19,000名工作人員，此外，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十萬名軍人也參加了行動<sup>⑮</sup>；另外，還吸收了鄰近的六七千達吉斯坦人和三千多奧塞梯人參加流放行動，完全是按照完成一次重大軍事行動的要求規劃和部署的。運送特別移民的列車總共180輛，每輛65節車廂；被流放的人數為493,269人（平均每輛列車運送2,740人）<sup>⑯</sup>。

1944年的2月23日，車臣人被從各個偏僻角落用汽車和馬車集中到鐵路上，然後運送到吉爾吉斯、哈薩克斯坦、西西伯利亞等遙遠的流放地。在

這期間，曾發生過軍隊施加暴力的事件，如海巴赫村(Хайбах)那樣的典型的悲劇：一些因種種原因落在後面的老弱婦孺以及行人總共約700人，被集中起來活活燒死<sup>①</sup>。在長達兩個星期的旅程中，許多人因寒冷、饑餓、環境骯髒和疫病而送命<sup>②</sup>。被流放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總數約為460,000人。據統計，從1943年到1949年，安置車臣、印古什、卡拉恰依和巴爾卡爾移民共計608,749人，因各種原因減員184,556人<sup>③</sup>。

與車臣人、印古什人一起流放的，還有一些其他民族的成員(當時沒有人去注意這些人的族屬)：阿瓦爾人、庫梅克人、猶太人等等，總共有500人；在向政府上書之後，他們大多被送回原地<sup>④</sup>。那些在軍隊中服役和在各地勞改營服刑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也在被流放之列。從前線召回的車臣、印古什等民族的軍官和戰士共計：軍官5,943人，中士20,209人，列兵130,691人。那些立過軍功的車臣族將士和與俄羅斯族男性通婚的婦女則屬例外。流放行動從2月23日持續到3月18日。1944年4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宣布移民工作結束(但是實際上，強遷行動到1945年還在繼續)。

與此同時，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的建制被撤消，不復存在。蘇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命令，建立格羅茲尼州，將其劃入俄羅斯聯邦。在強制移民行動完成後，1944年6月19日，格羅茲尼州黨委決定：將境內所有居民點更名，以便永遠消除關於車臣人的記憶。在車臣人、印古什人被遷出之後，共和國幾乎變空，蘇聯政府不得不從鄰近各州和共和國向格羅茲尼州遷入人口。

流放車臣人、印古什人等民族所帶來的消極後果是立竿見影的。在1944年流放前，當地有4,000多名車臣、印古什民族的技術人員和專家，他們被流放就嚴重影響了當地石油工業的發展。1944年，當地的石油開採速度立即下降了，很多油井沒有完成開採計劃，農牧業受到了顯著影響。同時，大批歷史文獻和文物遭到毀滅。

### 三 車臣人在流放地

被流放民族實際上是被剝奪了公民權(在政治聲譽方面，則成為國家公敵)，成為介於犯人和公民之間的「特種犯人」。138,788名車臣人和43,810名印古什人居住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有39,663名車臣人、1,389名印古什人；烏茲別克斯坦有120名車臣人、108名印古什人；其餘則分散在西伯利亞等地。這些外來移民在流放地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流放之前，蘇聯政府並沒有考慮他們的居住問題。在流放地，「特種移民」寄人檐下，形似難民。移民管理機構對他們進行嚴格監視，管制其生活和勞動。內務機構在「特種移民」居住地區設立了2,679個特別管理站，每一個站管理300人到1,000人(不包括未成年人)；此外，還通過在流刑犯中任命組長進行互相監督、監視。同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命令，凡是逃跑者將被罰做苦役二十年。

在高壓之下，車臣人認識到自己無力與政府對抗，因而佯裝馴順。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放棄回到高加索的想法，甚至不切實際地希望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對蘇聯施加壓力，以便

流放車臣等民族的具體負責人是貝利亞，他坐鎮北高加索，定期向斯大林彙報流放行動的進展。被流放民族被剝奪了公民權，成為介於犯人和公民之間的「特種犯人」。蘇聯政府還撤消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建制，建立格羅茲尼州，並將境內所有居民點更名，以便永遠消除關於車臣人的記憶。但是車臣人從來沒有放棄回到高加索的想法。

回到原居住地。大多數山民被安置到哈薩克平原，從事自己不熟悉的農業，許多人從草原逃走，遷居到城市的貧民窟<sup>②</sup>。在哈薩克斯坦，車臣人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帶到當地，並且繼續保持原有的社會組織、習俗和傳統。毛拉(Мулла)是車臣人社會中最受尊敬的人物，是當地社會中的另一個社會的領袖。這也使車臣人與其他民族——包括當地人和其他被流放民族——隔絕開來。像在北高加索時那樣，許多車臣人鄙視教育，得過且過，依舊偷竊、甚至搶掠，而且還盛行血親復仇<sup>③</sup>，蘇聯法律不能有效約束他們，因而其他民族對車臣人也感到某種畏懼。

車臣人與印古什人是同源民族，來到流放地之後，身處逆境，兩者經常互相埋怨，爭論在流放中誰的過錯更大。蘇聯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С. Н. Круглов)在1946年8月給斯大林、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日丹諾夫(А. А. Жданov)的報告中說，一些過去在蘇聯黨政機關身居高位的印古什人在言談中說，要不是和車臣人聯合在一起，印古什人就不會被流放。印古什人認為，是車臣人最先組織匪幫，並且與德國人合作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由此互相敵視<sup>④</sup>。

對於哈薩克的當地居民來說，車臣人是外來人，他們大量到來，勢必和當地居民爭奪資源，無疑是經濟上的一個威脅；加之，車臣人背負着有罪民族的頭銜，在當地人看來不啻是二等公民，理應受到歧視。與在北高加索故鄉相比，車臣人在中亞幾乎淪為社會底層。斯大林死後直到60年代，蘇聯境內的騷動與動亂層出不窮，民族之間的矛盾與糾紛也接連不斷，甚至發生多次群毆和械

鬥，而在有記載的若干次騷亂中，車臣人與其他民族的騷亂與衝突最多<sup>⑤</sup>(見表)。

車臣人還面臨其他來到哈薩克斯坦的外來人的歧視。在50年代中期，許多人來到中亞新墾地，形成一股新的移民潮，其中以俄羅斯人為最多；在這種情況下，矛盾根源就產生了。在更多的情況下，被流放民族都是顯然的受害者。1954年，俄羅斯人與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爆發衝突，最後演變為群毆，原因是車臣族學生在學校裏

暴力衝突的爆發地	衝突次數
處女地和新建地	14次
北高加索(有返鄉民族參加)	6次
卡爾梅克	2次
愛沙尼亞	2次
總計	24次
「可疑」的民族衝突*	11次
民族暴行	2次
1 俄羅斯人	19次
2 車臣人	14次
3 印古什人	5次
4 卡爾梅克人	2次
5 奧塞梯人	2次
6 愛沙尼亞人	2次
7 烏茲別克人	1次
8 阿塞拜疆人	1次
9 阿瓦爾人	1次
10 亞美尼亞人	1次
11 哈薩克人	1次
12 保加爾人	1次
衝突雙方	次數
俄羅斯人與車臣人、印古什人	13次
俄羅斯人與其他民族的衝突 (卡爾梅克人、烏茲別克人、 阿塞拜疆人、愛沙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保加爾人)	7次
車臣人、印古什人與其他民族	3次
其他	1次

\*「可疑」的民族衝突是指那些具有某種民族衝突意味的，但是在文獻中說法不一的衝突。

對於哈薩克的當地居民來說，車臣人是外來人，他們大量到來，勢必和當地居民爭奪資源；加之，車臣人背負着有罪民族的頭銜，在當地人看來不啻是二等公民，理應受到歧視。斯大林死後直到60年代，蘇聯境內的騷動與動亂層出不窮，民族矛盾與糾紛也接連不斷，在有記載的騷亂中，車臣人與其他民族的騷亂與衝突最多。

被稱作「祖國的叛徒」。1955年，又發生了俄羅斯人與車臣人的衝突，俄羅斯族流氓甚至襲擊了車臣人躲藏於其中的警察局。

蘇聯政府為甚麼要將車臣人流放到中亞呢？將一個民族從其世代居住的地方遷徙到遙遠陌生的異鄉，就等於摧毀其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失去與國家對抗的條件；此外，也不排除蘇聯領導人有其他意圖。當時烏茲別克黨委書記在塔什干黨委會議上說，來自西部的移民潮是因為戰爭形勢引起的<sup>②</sup>。有學者認為：「蘇聯的中亞需要朝鮮人，似乎是為了讓那些被社會主義集體化弄得荒蕪人煙的廣闊土地恢復生機。」<sup>③</sup>客觀地說，被流放民族和當地居民一起，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成為蘇聯勞動大軍（當然，是一種強制性勞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有人說，烏茲別克斯坦是由流放到此的克里木韃靼人建設的）。

#### 四 車臣人的平反與返鄉

車臣民族的平反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早在1954年、1955年、1956年上半年，蘇聯政府就陸續取消對所有日耳曼人、克里木韃靼人、卡爾梅克人、巴爾卡爾人的特別流刑登記，但是對於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的監視卻非常持久。1954年取消了對十六歲以下的車臣青少年的某些行政限制。1955年3月10日，車臣人、印古什人和卡拉恰依人得到身份證，隨後，1955年，蘇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又作出決議，取消對蘇共黨員的限制。蘇聯政府甚至已經打算恢復車臣人等民族的自治地位，但是，

內務部長杜多羅夫（Н. П. Дудоров）提出質疑<sup>④</sup>：

考慮到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在遷出之前居住的土地已經住滿，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從前的疆界內恢復自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而且未必能夠實現，因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回到原來的居住地必然會引起一系列不希望發生的後果。

同時，他提出在流放地為車臣人另建一個自治州，可是這一構想更難實現。

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對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揭露，意味着為車臣—印古什民族平反已為時不遠。1956年7月1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命令，撤消對特別移民區的限制，撤除蘇聯內務機關對於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的行政監視；同時也規定，不予歸還他們遷出時被沒收的財產，而且，他們「無權返回遷出地」。車臣移民在中亞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面已得到相當的自由，無須每天生活在內務部人員的監視之下，也無須定期向當地機關報告自己沒有逃走。這項命令給車臣、印古什等民族帶來鼓舞，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思鄉情緒萌發，開始以各種藉口返回北高加索。

1957年1月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又發布命令，首次認定：1944年3月7日發布的關於廢除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建制的命令，以及1956年的命令中禁止車臣人、印古什人返回從前居住地的條款均告失效；為給車臣—印古什民族的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承認必須恢復車臣、印古什民族的民族自治。隨着春季到來，車臣人和印古什人開始自發地大規模返回北高加

1956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命令，撤消對特別移民區的限制，撤除蘇聯內務機關對於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的行政監視；同時也規定他們「無權返回遷出地」。1957年最高蘇維埃又發布命令，宣告1956年的命令中禁止車臣人、印古什人返回從前居住地的條款失效。隨着春季到來，車臣人和印古什人開始大規模返回北高加索的故鄉。

回到北高加索的車臣人，由於在民族間衝突和鬥爭中的高度組織性和堅決意志，令競爭者感到懼怕而紛紛退卻。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車臣共和國內經常發生車臣人針對其他民族的挑釁和滋事行為。在1970年到1973年間，僅僅格羅茲尼的松日河區，就有九千名俄羅斯人被迫離開車臣—印古什共和國。

索的故鄉，因為他們害怕錯過春耕時間。同時，當地的工廠、企業和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也就順理成章地將他們開除，這樣也就使他們更加義無反顧地加入返鄉隊伍。於是，一方面，在中亞的處女地和新建地，車臣人、印古什等民族變賣家產，離開工作崗位，「坐在手提箱上」，急於回到北高加索；另一方面，在北高加索地區，由於車臣人、印古什人大量返回，而流放之前屬於他們的土地已經被來自俄羅斯內地的移民佔據，造成了車臣返鄉者與現在的居民之間的新矛盾，這樣，在中亞和北高加索兩個地方都形成了緊張形勢。

1957年，在赫魯曉夫的主導下，蘇聯政府對在衛國戰爭期間被懲罰的民族給予平反，並恢復了車臣人的自治共和國的地位。

車臣人陸續回來後，格羅茲尼州黨委書記雅科夫列夫(Я. Яковлев)稱：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返回是一個大錯誤。地方政府對俄羅斯聯邦的法令又做出修正：1958年7月16日，達吉斯坦蘇維埃共和國部長會議通過決議，對返鄉的車臣居民實行嚴格的身份證制度。為此採用了專用證件(持有這樣證件的人不得到原先生活的村鎮)，不許車臣人去世代居住的達吉斯坦的哈薩維尤特地區(Хасавюрт)。有人取道巴庫擅自進入哈薩維尤特，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被判刑。車臣人的返鄉進程一直持續到1959年春天，內務部人員還在捕捉車臣「逃亡者」。大部分人都選擇回到北高加索，有一些人則選擇留在當地；但是，留下來的人就成為後來發生在哈薩克斯坦境內反印古什人騷亂的受害者。

車臣人是如此珍視自己的故土，許多人將在流放地死去的親人屍骨運

回，為的是將他們葬在故鄉；許多人回來以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繕祖先墳塋。

返鄉的前「特種移民」堅決要求只「住在遷出之前居住過的那些村莊，甚至是自己的房子裏」<sup>②</sup>。這就涉及一個棘手的現實問題：那些村莊和房屋已經被他們遷出之後的外來人所佔據，而這就勢必要發生矛盾和衝突。1958年，格羅茲尼爆發了反車臣人的大規模騷亂，但是，由於車臣人在民族間衝突和鬥爭中的高度組織性，以及捍衛自己利益時表現出來的不顧一切的堅決意志，競爭者感到懼怕而紛紛退卻，車臣人成為這場「神經戰」的勝利者。

回到北高加索的車臣人，採用逐步排擠的辦法，使競爭者視與車臣人共同生活為畏途。許多俄羅斯人感到苦不堪言，並向蘇聯政府提出申訴，要求國家介入調解矛盾，或者乾脆要求遷出當地。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車臣共和國內經常發生車臣人針對其他民族(尤其是俄羅斯族)的挑釁和滋事行為——在1970年到1973年間，僅僅格羅茲尼的松日河區，就有九千名俄羅斯人被迫離開車臣—印古什共和國<sup>③</sup>。這些矛盾持續了很長時間，甚至直到90年代都一直存在。

## 五 流放導致的嚴重後果

由於車臣民族為數眾多的成員投敵附逆，因而，對車臣人的懲罰似乎並不那麼無辜，但是，將車臣人全部流放，卻未必是最佳的辦法；而在將其流放十年之後又為其平反，允許其返回，從政治角度來說，同樣缺乏深思熟慮。所有這些舉措加在一起，就

是一系列嚴重的政治錯誤。但是，如果將十月革命以來北高加索地區（特別是車臣）動盪、叛亂持續不斷的形勢前後聯繫在一起，那麼，流放客觀上懲戒了附逆行為，保證了衛國戰爭勝利結束，並維持了北高加索地區十多年的安寧和秩序。當然，這是通過非同尋常的高壓手段實現的，且短暫的安寧潛伏和預示着新的危機和矛盾；另一方面，卻使中亞社會形勢複雜化。

懲罰並不能培養一個民族對一個國家的認同和忠誠，將車臣人全體流放，只是在車臣人心靈中埋下仇恨和屈辱。流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車臣人對蘇聯政府的怨恨變成對俄羅斯民族的仇恨。流放還使得車臣人內部走向團結。作為一個外部因素，車臣民族的宗教信仰狀況發生了某種變化。車臣、達吉斯坦的蘇非教派（суфизм）得到了迅猛的、甚至是病態的發展，其特點是走向封閉、隱秘和極端，即使在蘇聯政府嚴密控制下仍能在地下狀態中頑強地生存和發展。90年代發

現，車臣以及整個北高加索地區竟然保留了許多中世紀的宗教典籍。流放和迫害導致了這些民族自我意識的強化，他們盡力保持自己語言和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以此作為對抗「俄羅斯化」的手段。流放是所有車臣人的共同命運。從普通民眾到民族精英，幾乎與生俱來都刻上了流放的烙印。看一下杜達耶夫（Джохар Дудаев）、馬斯哈多夫（Аслан Масхадов）等90年代活躍於車臣政治舞台的人物的履歷，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出生在中亞的車臣人。

車臣人被流放，是車臣被征服以來所遭受的苦難的延續。在十九世紀反抗俄國侵略的戰爭期間，近十萬車臣人死去；1936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期間，車臣地區有八萬人被處決，這是當時車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sup>⑥</sup>；1944年的流放導致約14.5萬車臣人喪生<sup>⑦</sup>。流放車臣人是錯誤的政策，它使得蘇聯複雜的民族形勢更加複雜。有人甚至認為，「全體流放整個克里木韃靼民族（以及許多高加索和伏爾

懲罰並不能培養一個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和忠誠，流放車臣人，只是在車臣人心靈中埋下仇恨和屈辱，使得蘇聯複雜的民族形勢更加複雜。有人甚至認為，全體流放整個克里木韃靼民族（以及許多高加索和伏爾加河地區的小民族）是蘇聯帝國崩潰的開始。圖為在烏斯季拉賓斯克火車站等候被流放到中亞的克里木韃靼人。



一位蘇聯詩人說過：被流放民族至今都「拖着災難和痛苦的裙裾」。流放事件這一集體的民族歷史記憶，是對車臣民族感情和尊嚴的戕害。雖然我們不認為1944年的流放事件必然會現成地導致1991年的車臣危機；但這種歷史記憶極容易被人利用，作為民族主義宣傳的工具，其鼓動民族感情、動員社會的能量是難以估量的。

加河地區的小民族)是被稱為蘇聯的帝國崩潰的開始」<sup>②</sup>。流放還導致車臣人在經濟上受到巨大損害，阻礙其社會進步。

由於被流放民族返回，再次引起一系列複雜問題。原來的原住民現在變成了外來人，他們都要求回到自己或者祖先居住過的地方，但是1944年之後北高加索地區的居民分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政府基本上按照流放前的情況為行政主體劃分疆界，恢復他們的原有建制(但也有一些例外，這是反映並照顧了1944年以後這裏的現實變化)<sup>③</sup>。車臣—印古什共和國的領土面積因此擴大了75%，這些土地多數來自俄羅斯哥薩克的平原土地<sup>④</sup>，這對於遭到十多年流放對待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來說，不失為一種補償。但是，這種做法也造成另一種印象：即不讓某個民族在數量上佔據絕對優勢，而是令其互相牽制，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此乃沿襲俄羅斯帝國時期「分而治之」的政策；但其結果卻正好相反：沒有一方覺得滿意。流放所帶來的領土變更造成很多隱患，是導致整個北高加索地區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長時期裏，車臣人心裏都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一種命運無定的感覺，民族精神趨於內斂，甚至也發生了某種扭曲，這是一種嚴重的「流放綜合症」。弱者容易認同強者的哲學。由於自己的苦難經歷，在問到自己最想幹甚麼的時候，幾乎每一個車臣人(甚至每一個小孩)都會回答說：在克格勃工作<sup>⑤</sup>！1990年對俄羅斯和哈薩克的車臣人進行的民意調查表明，對於「人生中甚麼最重要：物質還是精神？」問題的回答，大多數年齡在六十到八十之間的受調查者

都認為，精神要高於物質(那些年齡較輕的受調查者則稍有差別)。其原因除了是車臣社會的傳統外，主要在於：經歷過1944年流放的那些人體會到，不論你用幾代人的時間積累財富，而財富都可能在一瞬間喪失<sup>⑥</sup>。

當90年代到來時，許多1944年的受害者還健在，而他們的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每一個車臣人都可以從自己的前代人(父輩、祖父輩)那裏了解自己民族曾經遭受的苦難，這是一些很難平復的心理創傷。蘇聯詩人艾特瑪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當年說過：被流放民族至今都「拖着災難和痛苦的裙裾」。索爾仁尼琴說得好：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將來就會寫出多少部史詩。在90年代的北高加索地區，有許多文學藝術作品仍舊重複着1944年的主題。巴爾卡爾的藝術家還將那段歷史在銀幕上重現：那就是在當時很有名氣的電影《寒冷》(холод)。

流放事件這一集體的民族歷史記憶，是對車臣民族感情和尊嚴的戕害，它變成了一種「情感記憶」。歷史不單寫在紙上，也活在人的心靈中。當然，我們不認為1944年的流放事件必然會現成地導致1991年的車臣危機；但是這種歷史記憶極容易被某些人或勢力所利用，作為民族主義宣傳的工具，其鼓動民族感情、動員社會的能量是難以估量的。

在蘇聯解體、俄羅斯獨立以後，俄羅斯政府對於車臣民族依舊負有政治、道義和法律上的責任，而這是當年蘇聯政府對車臣民族犯下的嚴重錯誤所帶來的。當代俄羅斯政治家應該具有歷史感，他們比斯大林乃至後來的領導人更有優勢——託歷史的福蔭，他們來得及總結足夠的教訓：在

車臣問題上不允許再犯一點錯誤，否則就會付出更為巨大的代價。遺憾的是，歷史的發展卻總是充滿盲目性，不能盡如人願。

### 註釋

①⑤⑬⑱⑳㉑ И. Ф. Бугай,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7 (1990), 44; 38; 33; 40; 40; 33.

② 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 *Россия 20 века. Историки всего мира спорят* (Москва: Аст, 1994), 329.

③⑧㉒ Джеффри Хоскинг,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17-1991* (Москва: Русич, 2000), 261; 261; 261.

④㉓ И. Ф. Бугай, “Высе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их корейцев с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5 (1994), 147; 145.

⑥ А. Н. Сахар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20 век* (Москва: Аст, 1999), 381.

⑦ 拉津斯基(Эдвард Радзинский)著，李惠生等譯：《斯大林秘聞》(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頁37。

⑨ Влада Селина, “Депортация чеченцев и ингушей” ([www.rusichi.by.ru/history.depchechen.htm](http://www.rusichi.by.ru/history.depchechen.htm)).

⑩ Н. М. Раманичев, “Власов и другие” ([archive.1september.ru/his/2001/34/no34\\_01.htm](http://archive.1september.ru/his/2001/34/no34_01.htm)).

⑪ Лев Соцков,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епаратизм* (Москва: РИПОЛ-КЛАССИК, 2003), 24.

⑫ Николай Зенькович, *Тайны уходящего века* (Москва: Олма пресс, 2003), 446.

⑬㉔ 索爾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著，田大畏譯：《古拉格群島》，中冊(北京：群眾出版社，1996)，頁461；472。

⑮⑰⑱ Светлана Алиева, *Так это был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репрессии в СССР 1919-1952гг*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93), 2:169; 175; 222.

⑯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Народ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оюза ССР Генераль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www.yandex.ru](http://www.yandex.ru)).

⑳㉕㉖ В. А. Козлов,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 1953-начала—80 годов* (Сибирская хронограф, 1999), 122; 101; 110; 122.

㉗ А. Н. Сахаров, “Россия 20 века. Судьба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508.

㉘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КПСС: чеченцы и ингуши против русских”, 見[www.presscenter.ru](http://www.presscenter.ru), 22 октября 2002 г。

㉙ Алла Язькова, “Чеченская война: неизвлеченный урок”, *Открытая политика*, no. 3, 4 (2001), 72.

㉚ А. Р. Вяткин, Э. С. Кульпин, *Крымские татары: проблемы репатриации* (Москва: РАН, 1997), 24.

㉛ А. Искандарян, *Чече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прова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Кавказе* (Москва: Фонд Карнеги, 1995).

㉜ А. В. Пиночетов, *Предали* ([lindex.narod.ru/Lindex1/Shire03/Est03/1790.htm](http://lindex.narod.ru/Lindex1/Shire03/Est03/1790.htm)).

㉝ А. Максимов, “Между катастрофами: Чечня 20 Лет назад”, *Открытая политика*, no. 3, 4 (2001), 77.

㉞ “Система ценностей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чеченцев”，電子版Чечня и Росс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見[www.sakharov-center.ru](http://www.sakharov-center.ru)。

侯艾君 1971年生，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助理研究員。專業為俄羅斯史。已經發表論文(包括譯著)十餘篇。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由教育部委派赴吉爾吉斯國立大學訪學。